

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

MING QING SHIDAISHI DE JIBEN WENTI

(日)

森正夫

野口铁郎

滨岛敦俊

岸本美绪

佐竹靖彦

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013068258

K248.07
28

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

[日] 森正夫 野口铁郎 滨岛敦俊
岸本美绪 佐竹靖彦 编
周绍泉 栾成显 等译



K248.07
28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北航

C1675764

8258808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日]森正夫等编;周绍泉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09270-8

I. ①明… II. ①森…②周…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明清时代 IV. ①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8519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书根据日本汲古书院1997年日文版译出

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

[日] 森正夫 野口铁郎 滨岛敦俊
岸本美绪 佐竹靖彦 编
周绍泉 栾成显 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270-8

2013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8½

定价: 45.00 元

关于“中国历史学的基本问题”的出版

这次我们计划出版的“中国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丛书,是由以松丸道雄和古登贺为代表的編集委员会編輯的第一卷《殷周秦汉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以谷川道雄为代表的編集委员会編輯的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以佐竹靖彦为代表的編集委员会編輯的第三卷《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和以森正夫为代表的編集委员会編輯的第四卷《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共四卷组成的。贯穿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以个案实证研究所积累起来的学术成果为基础,进一步探求整体性的范围和历史面貌,可以说归结为一点,即寻求恢复历史学的整体性。

也许是处于适应和接受西方的冲击、侵略大陆及战败所造成的历史性的环境中,可以看到社会上一直要求我国的中国史学以某种形式表明历史学存在的理由。而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是一直重视对历史全貌的认识的。这可以说是在中国社会论和历史分期论等方面迄今对世界学术界的重大贡献。

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出现了摆脱这种整体认识的显著趋势,学界开始在关注个别事物和现象、埋头个案实证方面取得了意义深远的丰富成果。

只要我们自身是个别的、个体的人,理所当然,令我们感兴趣的就是个别的、个体的对象。但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性的经济高速

增长,迄今没有在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等方面,抓住与人类历史自身相关的深刻的课题。我们归根结底是社会上的存在,不能彻底摆脱历史的整体性的问题。作为这种状况中的计划,本计划首先从研究者各自就其专门领域提出的基本性的思考问题出发,力图迈出恢复历史学整体性的第一步。

佐竹靖彦

1995年9月9日

中文版前言

《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一书,承蒙中国同行之不弃,得以译成中文出版,这对于从事中国明清史研究的日本学者来说,实可谓不胜荣幸之事。

1945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四年后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其后,在日中邦交尚未实现正常化的情况下,中国的学术代表团于1955年和1963年先后两次访问日本,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两国的学术交流还十分有限。1972年日中邦交恢复后,中国政府于1979年设立奖学金制度,开始接受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由此,日中两国间的学术交流始趋活跃,并很快呈现快速发展之势。回顾这段历史,特别值得一述的是:即使是在1979年以前日中两国学术界缺乏交流的情况下,在日本,研究包括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等在内的“中国学”的学者们,仍通过中国学者发表的著作和论文,积极吸收新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其中,尤其是从事明清史研究的学者们,十分关注该领域中国同行们的研究,对其成果认真加以吸收。究其原因,盖为日本学者有关商品生产的研究和中国学者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名称虽异,而彼此所关心的问题却不期而一致之故。

1955年12月,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团长的学术考察团访问日本。其间,考察团一行中的历史学者和日本的中国史学者进

行了座谈。在此次座谈的基础上,铃木俊先生和西嶋定生先生主编了《中国历史的时代区分》一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该书收录了翦伯赞先生在日本所作的题为《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5年第2期]的报告全文翻译。另外,还有田中正俊先生的《中国历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一文。日本的中国明清史学界对中国同行们的研究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1961年,傅衣凌先生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一书由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使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他文献资料,从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考察了华中和华南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该书对日本学界影响甚大。其后,6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的《历史研究》杂志上先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引起了日本学界的很大关注。其中,涉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文有李文治先生的《论清代前期的土地占有关系》(1963年第5期)、从翰香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诸问题》(1963年第6期)。除此之外,王毓铨先生关于军户和军屯的研究,王守义、刘重日两位先生关于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均田”口号的研究,以及魏金玉先生关于佃农身份的研究等论文,在日本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自新中国成立不久的50年代起,日本学者在从事作为外国历史一部分的中国明清史研究时,即已通过中文著作和论文等,汲取着中国学者在研究作为其本国历史一部分的明清史时所取得的成果。日中两国明清史学界的学术交流迄今已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了。

进入80年代后,日中明清史学界的交流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十分活跃,历史学杂志相继创刊,史学著作不断问世,明清史方面的大量著作和论文被介绍到日本。第二,两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空前频繁。一方面,大批日本学者以各种形式访问中国,有的作为学术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有的参加中国方面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也有的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文部省或民间奖学金的资助,在中国从事长期的访问研究,由此他们得以同中国学者交换看法,或收集文献史料,进行学术调查。另一方面,中国学者接受日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邀请,也得以来日本作长期或短期的访问,与日本学者相互切磋,或收集日本保存的中国方面的文献资料。进入90年代后,日中两国间的学术交流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日本学者有更多的机会与中国学者合作,在中国实地进行文献调查和社会调查。同时,日本学者邀请中国学者访日,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解读文献资料,进而从事共同研究的实例也时有所见。这些既标志着一种新潮流的出现,又意味着双方学术交流的加深。

然而,应该指出,日中两国间学术交流虽有持续发展之势,就明清史学界而言,则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两国学者对于彼此出于何种目的选择研究课题,使用何种方法展开研究等似乎漠不关心。比如就鱼鳞图册、里甲制、一条鞭法、市镇、身份制以及民间宗教等方面的研究而言,目前双方学者对于谁在研究哪个课题,彼此都有相当的了解。但具体某个学者为何选择该课题,以何种方法开展研究,则相知甚少。

毋庸赘言,日中两国虽然同处21世纪之前夜,但在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则各不相同。自然,两国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上出现差异亦是不难理解的。对中国学者来说,明清史是其本国历史的一部分,并且与当今时代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中国学者在对各个具体历史史实的认识上,有着日本学者无法比拟的深邃的造诣。相比之下,明清史对日本学者来说是外国历史的一部分,这决定了在研究明清史时,日本学者在诸多方面远逊于他们的中国同行。这种差距,大则表现在对整个历史史实的掌握上,小则反映在对楷书以外的文献的解读以及进行实地调查时的汉语水平上。因而可以说,中国学者可向日本同行所学者甚少,日本学者应向中国同行所学者甚多。

日中两国的明清史学者的交流虽然不断深化,而彼此间仍存在上述隔阂,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当今世界各国在迈向 21 世纪之际,在环境、资源、人口以及教育等方面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而地理上同处亚洲、历史上渊源颇深的日中两国之间,更有着不少需要相互合作之处。为此,我深感作为共处于今日之世界、今日之亚洲的友人,日中两国明清史学界的同行,在从事与各自国家的当代社会具有密切关联的明清历史的研究时,双方在研究课题的选定、研究方法的采用上,实有增进交流、加深理解之必要。就这个意义而言,在日中两国学术界几无往来的 50 年代和 60 年代前半期,日本学者关注中国学者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时的课题选定和方法,这可以说时至今日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实际上,目前在日本,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们埋头致力于各自的实证研究,彼此在研究目的和方法上也互不关心。研究宋代史的

学者佐竹靖彦先生率先呼吁改变这一现状,为此,近年汲古书院出版了“中国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丛书。其中由滨岛敦俊、岸本美绪、野口铁郎、佐竹靖彦和森正夫主编的《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一书于1997年10月出版。本书将当今日本的明清史研究分为21个专题,分别由目前在该专题的研究中最为活跃的学者执笔。森正夫的《总论》在对战败后日本明清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和方法作一历史回顾之后,根据本书内容将21个专题整理成“商品市场、物价和货币、商人与财政”、“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社会和都市社会”、“明代的专制国家、王府、军队”、“身份感觉和秩序意识”、“徽州文书的世界”等12个主题,分别加以简单介绍,并提出笔者个人的看法。

本书最大的不足之处是,除了有关徽州文书的部分之外,涉及的范围仅为日本的明清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未能涵盖中国学者在明清史研究方面的大量成果,因而也就无法全面地介绍日中两国明清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尽管如此,本书对于中国读者了解日本的明清史学者出于何种目的选择研究课题、以何种方法展开研究,应该说的不无裨益的。如果本书中译本的出版能有助于加深日中两国明清史学界的相互理解的话,亦当有益于两国人民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合作。

最后,谨代表日本方面的有关学者,向参与本书翻译出版的各位先生,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周绍泉先生致以诚挚的感谢。

森正夫

1999年8月7日于日本爱知县立大学

目 录

总论	森正夫(1)
商品生产研究的轨迹	山本进(69)
明清农业论	川胜守(93)
明清时代的生产技术	唐立(114)
农村社会	
——研究笔记	滨岛敦俊(141)
赋役负担团体的里甲与村	岩井茂树(166)
明朝初期的海禁与朝贡	
——理解明朝专制统治的一个途径	檀上宽(185)
王府论	佐藤文俊(214)
明代军事史的研究状况	川越泰博(241)
“满洲”(manju)王朝论	
——清朝国家论序说	石桥崇雄(260)
清代的政治与政治思想史	大谷敏夫(289)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的再思考	小林一美(308)
秘密结社研究回顾	
——现状与课题	野口铁郎(341)
明清时代的身份感觉	岸本美绪(364)

合意与齐心之间 寺田浩明(387)

长江上游流域的移居与开发

——生成的“地域” 山田贤(400)

华南地方社会与宗族

——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地缘社会、血缘社会、

图甲制 片山刚(422)

徽州文书和徽州研究 白井佐知子(450)

出版文化与学术 井上进(475)

庶民文化 大木康(496)

西南少数民族

——围绕土司制度及其解体过程 武内房司(514)

中国周边地区的明清时代史

——以越南经济史为例 桃木至朗(537)

编后记 森正夫(566)

本书执笔者介绍 (568)

本书中译者情况 (576)

译后记 栾成显(578)

总 论

森 正 夫

绪 言

英国在1842年《南京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中要求中国割让、并在1898年进而以更大范围租借的香港,1997年回归到了中国。令日本大学专攻中国史的学生们感兴趣的,一方面是包括这段岁月的近现代史,但更多的是遥远的古代,尤其是中国皇帝制度创始时期的秦汉到隋唐帝国时代。这种倾向虽然未必是在近年才开始出现的,但近几年确实越来越明显。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们有机会多次访问中国,了解到中国学者认为明清社会是今天中国社会形成的直接源头,我们自己也经常看到一些城市和长江三角洲的农村城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代的风貌。但是在日本,学生们以及大多数人,却少有这种感觉和体验。

从日本人平常所关注的角度来看,内藤湖南称作中国近世史开始期^①的宋代到清末,这段占了近世大约千年历史的2/3的时代,无疑是十分遥远的。从14世纪后半期明朝建立,到20世纪最初10年辛亥革命使清朝灭亡为止的明清史研究,在日本是在怎样的关注下开展起来的呢?

正如本书各篇文章标题所示,研究者们对明清两个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的各种事物怀有多样的兴趣。然而,这些研究者们都生活在

当今同时代的日本,呼吸其空气,因此,不论是否明确指出,他们的研究无疑包含了学者们自身对当代的关注。

大约半个世纪前,即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战后日本的中国明清史研究,较之战前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当时作为一个研究者,他们是如何把自己生活的时代和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结合起来的呢?简言之,这是他们把近代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认识角度所决定的,是生活在近代日本的认识,使他们把自己与中国的明清时代联系在了一起。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北村敬直的观点就是一个佐证。

北村在1948年和1949年发表的论文^②中,提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他指出,从社会经济史上看,近代史就是外国资本侵入,从而导致中国经济由解体到崩溃的过程。而且,北村还认为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出现了解体、崩溃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他很关注作为中国近代史前史的明末清初时代。北村在1949年发表的论文中,对明末清初的定义较之以往更为宽泛,即“明代中期,也就是16世纪开始,直到清朝后期,近代欧洲势力侵入中国的19世纪中叶”,他认为这个时代“与其说是停滞性的,毋宁说是过渡性的”。

先于北村从1944年开始基础研究工作的西嶋定生,在1947年到1949年连续发表了有关长江三角洲棉业的研究成果^③,该研究意在验证作为农民副业生产的棉丝和棉织物手工业是否具有面向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性。虽然西嶋的结论是“还不具备向近代化转变的任何契机”,但是把明清时代视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在这一点上却和北村相同。研究农民阶层分化的,除北村之外,还有古岛和雄^④;研究绢织物手工业生产的,除西嶋外,还有田中正俊、佐伯有一^⑤;他们都关注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在这些学者的带动下,以商品生产出现为课题的一系列研究直到50年代都十分活跃。

1957年出版的佐伯有一《日本对明清时代商品生产评价研究——学说史的展望》一书收录了这些研究成果^⑥。另外,与此课题并非直接相关的研究也很活跃,如1956年出版的《东洋史料集成》中国明代及清代卷中所见^⑦,这些研究以社会经济史为中心,包括税役制度和专卖制度。特别是由藤井宏执笔的明代部分,充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该部分还谈及1949年出版的岛田虔次的《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⑧,在根本不使用商品生产这个关键词的岛田著作里,也可明显地看出其对西欧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关注。

40年代后半期到50年代的日本明清时代史学者的研究视角,从60年代起开始发生变化,进入70年代,这一现象已十分明显。把近代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来认识,并以此为基准把握中国的明清时代的大框架得到了继承。但是,其关注的对象不仅仅是在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一中心概念直接相关的手工业、农业领域,还扩展到其周边的领域,也就是说,不仅是经济史,经济史与政治史、社会史的关系也得到了重视。新研究生院制度的建立,使研究人员增多,实证研究水平提高,这也是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反映这一变化的代表,如“商品生产和地主制”这一说法,将地主制与商品生产并称,在日本史和西洋史的影响下,对地主制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把地主制视为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标志^⑨之一。认为地主以其在王朝国家制度上的地位和地域社会上的存在形态,理当称作“乡绅”。

众所周知,1971年,重田德使用了从50年代开始就为一部分人关注的“乡绅”一词,创造出作为“明末清初以来封建阶级支配形态”之一的“乡绅支配”概念,并据此提出“在中国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体制本身中发现封建国家性质的课题”^⑩。在此之前,1968年,小山正明已发表了关于明末清初“乡绅土地所有”的卓见^⑪。1961年,小山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中提出,与其把明末清初时代的变化与“近

代或资本主义之类的东西”联系起来,不如找出“中国史自身应有的变化途径”^⑫,表明他对从封建制孕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域的历史经验中提取出的不具普遍性的特殊侧面的关注。从1976年到1977年,在我发表的《关于日本明清时代史研究中的乡绅论(一)、(二)、(三)》^⑬中,曾把重田、小山的一系列见解概括为“乡绅论”,肯定了“乡绅论”在战后明清史研究中的地位,认为明清史研究方向的这种变化是“由普遍到特殊,从发展到结构”。

然而,重田、小山的乡绅论,仍把中国历史上封建制的存在看作是世界历史必然发展过程中的一环,而且是封建制向资本制转变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重田、小山和北村等人一样,将自己与明清时代结合在一起的媒介是近代资本主义。可以说,他们继承了把近代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

进入80年代,从事中国秦汉到六朝隋唐研究的渡边信一郎和主攻明清史的足立启二等开始了中国史研究会的活动。1983年,中国史研究会出版了从中国王朝创始时期到近代的各时代综合性研究论著《中国史像的再构成——国家和农民》^⑭,书中强调了在中国各个时代,小生产经营方式一直根深蒂固地存续着,国家公共职能的比重具有决定性等观点。1991年,该研究会出版了第二部著作《中国专制国家和社会统合》^⑮。在这两部著作中,对于把近代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中国史研究会的态度并不是很明确,而明确表态的是足立启二,他在1993年中村哲编著的《东亚专制国家和社会、经济》^⑯以及1994年中村哲编著的《东亚资本主义的形成》^⑰两书中各承担了一章的写作。在后一部书的第一章“中国近代化的政治结构”中,他指出,在中国“无论是代议政体的共和制政治结构,还是掌握社会全体的行政结构,以及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都“没有充分地建立起来”,因此,“如果以欧洲为衡量标准,中国则没有进入近代社会”。

但“19世纪末,中国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出现了推行相应的一系列政策的政权,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变为由国家权力推进资本主义工业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此不能不说它就是一种近代”。足立进一步指出:“近代化即资本主义化、政治近代化,表现为支持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权力机构的形成。”足立在该章的写作目的中,对中国史研究会的目标做了如下概括,“通过对封建社会和专制国家这两个人类史上对立的社会形态向近代转变的比较研究,寻求较之由世界历史规律规定的单一发展论更为寻常的历史发展模式。”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史研究会仍然注重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为指标,研究现实中的自我与包括明清史在内的整个中国历史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其与70年代以前的日本的明清史学者的研究立场是相同的。但是,时至今日,中国史研究会和大多数明清史研究者之间,尚无进行充分的学术讨论。

自西嶋、北村等开始研究以来,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在送走90年代、迎来21世纪的今天,研究者们的问题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本书中小林一美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的再思考》一文的基调即可以反映这一变化的一个侧面。他认为,战后到70年代的“日本对中国农民运动史研究”中,在与日本史研究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模式(思维框架的整体结构)”(小林语)从80年代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根据小林的观点,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针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分化、剥削关系、阶级斗争等政治、经济的民众运动”而展开。正如小林所说,这是因为那些应看作是“封建制残余”的事物,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斗争、战争与和平等将世界一分为二的对立”,是学者研究时所面对的现实,而对于属于这个“对立”一极的社会主义、民族解放斗争、和平的愿望,决定了众多研究者的思想。小林与我都是从60年代开始从事